

藏海观潮

奇极中又极奇之吴彬《十面灵璧图》

◎黄宗慈 文/图

2020年10月18日,明代吴彬的《十面灵璧图》长卷,在北京拍卖会上经过四十多分钟轮番竞价,最终以近5亿元人民币成交,创下中国艺术品史上最高单价!打破两年前在香港,由苏东坡《木石图》创下的4.5亿元人民币纪录。到底这件长二十七公尺的作品有什么奇特之处,能让书画收藏家为之狂热呢?

晚明变形主义画风

《十面灵璧图》是明代画家吴彬受“石隐庵居士”米万钟所托,描绘他所珍藏的一块“供石”。画石头不稀奇,不过吴彬竟然将一颗石头画出十种不同角度,那就很稀奇了。吴彬生于福建莆田,白屋寒门,年轻时就背井离乡,遍游江南。明朝万历年间,吴彬在科举中拔得头筹,进入宫廷画院为帝作画。当时的画坛以摹古风格最为流行,但吴彬不随波逐流,不断求新求变,时人誉为“画仙”。吴彬的作品主要以山水、佛像、人物为主,线条勾勒诡异怪奇,常出现不合现实的比例与形态,因此,艺术史学者将他与其他同时代的四位书画家,归类为“变形主义”。

赏玩供石文人痴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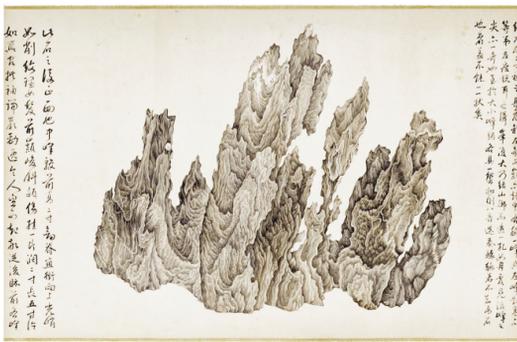
“供石”,或称作“赏石”,常见的种类如灵璧石或太湖石,是文人精心挑选出奇形状的石头。出于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崇敬之心,文人将石头供奉在住处。观赏供石就像观看一个小宇宙,是自然界崇山峻岭、层峦叠嶂的缩影。此外,供石之所以惹人喜爱,据说是因为它能提高爱石之人的修养。凝神注视供石的各种形态与纹理,文人心中千回百转

的思路,似乎都反应在石头的脉络之中。文人藉由观赏供石激发想象力,供石也联系了文人的性灵与自然界无穷的创造力。历史上有众多为供石痴迷的人,还有一个专门的戏称——“石痴”。许多石痴都是极有文化素养的文人书画家,熟稔儒家教义,能书善画,爱石成痴最为出名的人物,应是宋代书画家米芾。米芾的恋石成癖,让世人昵称其为“米痴”。文人瞻仰“供石”,以石头寄情抒怀,这种艺术形式到了明代已经相当成熟。即使如此,将同一块石头以真实大小画在卷轴上,背景完全留白,看似浮在空中,且以不同角度呈现,仍是前所未见,吴彬的画卷堪称中国绘画史中“画石”领域的里程碑。在怪诞诡谲的画风中,一石十面,似乎不只展现了供石的全貌,也勾勒出石头的灵魂。这也让《十面灵璧图》在艺术史上有无可取代的地位。难怪米万钟在卷尾的跋文中感叹:“何奇极中又极奇至此乎?”

十一题跋意义非凡

在中国书画上的文字,概略可分为:“引首”及“题跋”。“引首”是指在卷轴最前面所留的空白处,题写画作名称或是一则概括的品评,多为四字。

“题跋”则是写于画作本幅的文字,内容多为鉴赏、考订、记事等。《十面灵璧图》附有多达十一则题跋,由初代主人米万钟、礼部尚书(相当于教育部长)董其昌等十一名文人题写,还有邢侗、黄汝亨分别题引首“岩壑奇姿”与“五岳片云”,可说是集明清两代书画大师墨宝的珍品。



吴彬《十面灵璧图》画风诡谲



灵璧石摆件



《十面灵璧图》全卷展开

馆藏文物

1936年10月9日、22日,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分别到达甘肃会宁、隆德将台堡(今属宁夏西吉),同红一方面军会合。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,标志着历时两年、征途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。长征的胜利,以不可置疑的事实向世界表明,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,具有无比顽强的伟大生命力。

艺术化地高度概括并反映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经典油画《三大主力会师》,是由著名画家仇德亮、张自巍在1977年共同创作而成,又名《三军大会师》,纵166厘米,横331厘米,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该作以壮阔的图像画面、精湛的艺术手法,表现了红

军一、二、四方面军;右上方飘扬的旗帜下,正是原地休整、军服整齐的红一方面军。左下方由三位身扛步枪、肩背斗笠、外穿羊皮袄欢呼相拥的红军战士组成;右下方是一位头扎羊肚毛巾的陕北赤卫队员,兴奋地将红军小号高高举在空中,紧挨一旁的红衣女孩挽着干粮筐,满脸盈盈笑意。整个画面上,由右而左、由左而右、由下而上共三组九人构成了稳健、和谐的三角形内构,向心汇聚,中间还安排了两位相向奔拥的青年战士;而三面军旗与军民所构成的左右向心式的胜利大会师场景,包括人物向上跳跃的欢快姿态,更使画面的动感、动势既强又稳,互为呼应,富于强烈的艺术震撼力。

三军过后尽开颜

——油画《三大主力会师》赏析

◎周惠斌



蔡亮 张自巍《三大主力会师》油画 166×331cm 1977年

军三大主力历经生死考验,像三股澎湃的洪流,以不可阻挡之势,汇聚陕甘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和宏大场面。作品问世后,以其人物形象众多、形态生动准确、表情丰富传神,引起广泛关注,好评如潮,在我国当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。

《三大主力会师》构思缜密,布局严谨,节奏明快,动感强烈,通过画面左方两队挥舞旗帜、拉着战马、扛着机枪的红军(意指刚刚到达的红二、四方面军),风尘仆仆、快步奔跑的场景为主线而次第展开叙事情节。画面中心上方,三位斜背盒子枪、紧紧拥抱的红军指挥员代表着

作品中,两位画家以革命浪漫主义情怀,倾情展示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。三军将士胜利会师时所表现出的兴高采烈、欢声笑语、群情激昂、喜极而泣、昂扬豪迈,二三十位红军战士欢聚时所展露出的丰富多彩、栩栩如生的神态和表情,生动演绎了“三军过后尽开颜”的热烈、激动、欢欣和喜悦。同时,用色精准,光线明快,虚实相间,暖色调的充分运用和光感的精心表现,赋予了画面阳光般的温暖,既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,也充分体现了画家精于整体构思、场景再现、形象塑造及技法表达的艺术表现力。

藏品鉴赏

粉彩帽筒霜菊开

◎吕冠兰 文/图



绶带秋菊纹粉彩帽筒(民国)

霜降时节,严霜降临,万物蛰伏,唯有菊花凌然开放,透出一股惊世骇俗的能量和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,令人备受鼓舞。正因如此,霜后菊花才为历代文人雅客所吟咏。

早在两千多年前,大诗人屈原便在《离骚》中写下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的诗句,木兰坠露、秋菊落英被屈原视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象征,成为洁身自好的代名词。魏晋时期,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(《饮酒》),不仅是一种天高云淡的意境,更印证着诗人的归隐生活,乐山乐水,自得其乐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极度欣赏霜菊的品格,他在《咏菊》诗中写道:“一夜新霜著瓦轻,芭蕉新折败荷倾。耐寒唯有东篱菊,金粟初开晓更清。”刘禹锡在《菊花》诗中亦对霜菊不吝赞美之词,“桂丛惭并发,梅蕊妒先芳。一人瑶华咏,从此播乐章”,霜后菊花,不啻为独领风骚者。宋人对霜菊也大加赞赏,如韩琦在《九日小阁》诗中便说:“莫嫌老圃秋容淡,且看寒花晚节香。”陆游在《陶渊明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盖以菊配松也余读而感之因赋此诗》一诗中写道:“菊花如端人,独立凌冰霜……高情守幽贞,大节凛冰刚。”称赞霜菊拥有耐得住寂寞、守得住节操的品格。明清以来,对霜菊的吟咏更是汗牛充栋。

笔者收藏有一只民国的粉彩帽筒,便是以霜菊为题材。它呈圆柱形,口径10.8厘米,高23.7厘米。在帽筒的外壁上,绘制霜菊图,只见一丛菊花在山坡上倾斜生长,茎秆纤细,叶片肥厚,有两朵菊花正娇艳地盛开在枝上,其中一朵很像牡丹,花瓣白色,蕊蕊黄色,就像众多银丝捧出一团黄金,另外一朵很像荷花,花瓣有的呈紫色,有的呈白色,姿色绝艳。还有两朵小菊花,它们就像是两朵大花的翻版,一黄一紫,傲立在枝头,迎着朝阳,绽放出笑脸。在菊丛旁边,还有三朵葵花,如圆盘状,朵朵向阳。又有两枝秋海棠,它们结着红彤彤的海棠果,好像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枝上。其中一枝海棠枝条很长,一直伸到筒壁边缘,上面站立着一只绶带鸟,它有着尖尖的喙、长长的冠,尾巴也很长,就像绶带一样。看来,此时正是霜浓雾重的深秋时节。

在我国文化中,菊花是耐寒傲霜的代名词,另外,菊与久读音相似,有长长久久、天长地久之意,绶带是古代官印的配饰,指代位高权重,绶又和寿同音,绶带鸟也叫寿带鸟,因此,帽筒上的图案可解读为既得高位,又得高寿,官运亨通,寿比南山,福祿连绵,长长久久。此外,菊为霜后之菊,也可看出制作者的“用心”——宦海浮沉,我为霜菊,常开不败,永在枝头,这便是霜雪精神。事实上,它更是一种中国精神——历经霜雪仍能绽放,历尽艰险仍能笑傲!

收藏文化

秋操杯上强军梦

◎谢丽成 文/图



粉彩秋操杯(清)



粉彩秋操杯(清)

图中这件形似荷花的仿生瓷器,有一个怪异的名字,秋操杯。无论荷花还是仿生瓷,都和秋操搭不上关系,可它为什么叫秋操杯呢?事实上,在它背后,有一段略显尴尬的历史往事。

秋操杯,确实和秋操有关。在古代,军队在秋季进行操练便叫秋操,而在清末,由于新军的日常训练被提上日程,秋操更是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军事要务。清朝末年,由于清政府腐败不堪,再加上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,让中国割地赔款,导致国家积贫积弱,民众灾难深重、民族落后受欺。为了维护统治地位,清政府进行了一些变革,训练新军便是其中重要一项,购买新武器、运用新方法、采用新编制、进行新变革,新军的出现,让国人看到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的曙光。因此,为了振奋士气、鼓舞精神,清政府于1905年至1908年的四年间,分别在河北河间、河南彰德和安徽太湖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,即秋操。秋操杯,便是在军事演习时为表现好的军官和士兵准备的奖品。

这只秋操杯,就像一朵微微绽放的荷花,在荷花的左侧,有一根呈壶嘴状的荷茎。它长20.5厘米,宽11.7厘米,高7.3厘米。花瓣红中有粉,粉中有白,荷茎浅绿带黑色斑点,形象逼真,气质迷人,令人爱不释手。在荷茎外侧,留有长条状空白,其上以楷书写有“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太湖附近秋操纪念杯”的款识,看来,这只秋操杯是1908年安徽太湖边的那场秋操所用。只不过,由于年代久远,当时为何人所拥有已经无法考证。

这只秋操杯,“荷茎”中空,内有圆形小孔,一直通向杯底。斟满酒时端起来,对着“荷茎”顶端吮吸,便能喝掉杯中美酒,看来,在制作杯子时,工匠不仅花费了一番功夫,更动了不少心思。也难怪,这毕竟关系着军队的士气和朝廷的颜面。

然而,此时的清政府,已经是“日薄西山,气息奄奄”,像这样的秋操,只是“形象工程”和“面子工程”,给清政府撑场面、装门脸的用,非但起不了什么作用,反而加速了清朝的灭亡。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是光绪帝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头,在这一年,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离世,大清帝国也在三年多后寿终正寝,而率先在武昌城发生起义,导致清政府倒台开张的,正是这支新军。

看来,富国强军,最重要的还是要自立自强。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,只有自立自强,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,才能让国家富强、民主复兴,因此,秋操杯不仅是纪念杯,也是警示杯,告诫我们要自警自省,促进我们要自立自强。

藏海拾贝

“纸上钻石”——藏书票的收藏

◎谭云

对于藏书票,现在许多人可能感到有些陌生,其实,熟悉、喜欢藏书票的人大有人在。

藏书票不同于书签

藏书票,顾名思义,就是用于藏书的个人名票。藏书票不同于书签,它是书籍收藏者的藏书标签,既用来增添书的珍贵和美感,也表明它的归属。藏书票一般边长5到10厘米,方形或长方形,绘有图案,藏书者购得书籍后,将藏书票贴在书籍的里封补页或扉页上,写上自己的姓名或别号、斋名等,国际上通行的是在票上写上“EX-LIBRIS”(拉丁文字),意为“我的藏书”,表示此书“属于私人藏书”。它与我国传统的私人藏书印有着相似之处,只是更具艺术性。

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,流行于德国,随后开始传入其他国家。过了将近一百年,藏书票才被欧洲传教士带入中国。上世纪30年代,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,一些版画家开始创作、印制中国风格的藏书票。当时,我国一批著名作家,如叶灵凤和郁达夫等,对藏书票兴趣浓厚,积极宣传介绍,并亲自制作有个性的藏书票。也许是日寇侵略战火纷飞、民不聊生,也许是国人对这种纸票感到不如藏书印章灵活实用耐久,总由于多种原因,藏书票经过一番起伏后,逐渐淡出生活,以至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内,藏书票在我国许多地方销声匿迹。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,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提高,中国的读书群体迅速发展,收藏书籍的人群不断壮大,长时间沉寂的藏书票,又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中。

贴有藏书票的书籍确实与众不同,当你翻开书籍的封面,印制精巧、图文并茂的藏书票呈现眼前,往往让你兴趣倍增,因此,藏书票被人们誉为“版画珍珠”“书上蝴蝶”“纸上钻石”等。

藏书票的品种繁多

藏书票品种很多,从创制时的黑白木刻,到现代的套色木刻、石版、铜版、丝网版、塑料版等等,票面形状也是各种各样,内容更是包罗万象。但是,不论用什么材质、用什么形式、表现什么内容,藏书票大致有五大类型。

一类是一幅幅绘制而成的,比如目前存世最早的一枚藏书票,就是手绘的一只刺猬衔着一枝野花,顶端的缎带上写有德文“慎防刺猬,随时一吻”,警示他人不要偷拿此书。过去藏书票大都是文人自娱自乐的玩意,较少流传。这类藏书票现在并不多见,可称为“手绘藏书票”。

另一类是由版画家制作的,此类最多,我国上世纪30年代流传的藏书票大都是版画类型。上世纪中叶,国际书票联盟发布了20余种通用编号,用以区别和规范书票制作的版种和技法,这类可称为“版画藏书票”。

第三类便是我们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印制的藏书(刊)票,可称之为“通用藏书票”或“印刷藏书票”。有的藏书票还像邮票一样,打上齿孔,背面有胶,买来使用时,随手撕下一张,贴在书的扉页上,签个名,十分方便。

第四类藏书票,则是“电脑藏书票”,这类书票与印刷的藏书票均与现代科技联姻,普及了藏书票,只是毫无艺术可言,没有收藏价值。

第五类藏书票是“剪纸藏书票”,它是将传统的剪纸与藏书票进行完美结合,形成一种民间艺术型藏书票。